

追尋現代中國學術的傳統

◎ 歐陽哲生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我們這一代經歷過文革的「知青」，近二十年來經歷了兩次自我調整。第一次是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我們在反省「文革經驗」時，從對政治運動、教條主義、極左政策深惡痛絕的覺悟中，逐漸走向獨立思考，解放思想。第二次是從90年代初開始，年青的人文學者在一種比較特殊的社會環境下又一次進行自我調整，這就是圍繞學術規範、人文精神的討論。這次調整的標誌是《學人》創刊號上那一組「學術史筆談」文章。六七年過去了，《學人》的一些作者身體力行，各自推出了比較成熟的著作，在北大出版了一套「學術史研究叢書」，頗引起學界關注。最近當我讀完陳平原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時，有一種感覺，平原當年大概是早有想法且有決心的。此書是他用六年的心力，在北大三度開設「學術史研究」這門課，且在《學人》叢刊上發表了系列相關論文後的一個結晶。他從文學史轉向學術史研究，不僅表現了他對拓展一個新的研究課題的銳勁；更重要的，是表達了他對承繼學術傳統和對自我在學術史上的定位的關懷。

寫作學術史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怎樣寫？寫作目的為何？對此，各人的看法自然會有不同，一般人喜歡標榜自己研究學術史是為了客觀敘述學術演變的歷程，陳平原對此則有他自己的獨特看法。他在北大開設「學術史研究」課程的簡介中如是說：

學術史的主要功用，還不在於在對具體學人或著作的褒貶抑揚，而是通過「分源別流」，讓後學了解一代學術發展的脈絡和走向；通過描述學術進程的連續性，讓後來者盡快進入某一學術傳統，免去許多暗中摸索的工夫。這不只是一項研究的課題，更是一種自我訓練，在探討前輩學人的學術足跡及功過得失時，其實也是在選擇某種學術傳統和學術規範，關鍵是在研究過程中，親手觸摸那個被稱為「學術傳統」的東西，有過感覺和沒這個感覺就是不一樣。具體的知識和技能可以講授，而這種學術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和領悟。治學不只是求知，不只是擇業，更體現為一種人生選擇和人生價值追求。

我以為這是頗具個人感受的經驗之談。按照這一看法，他的著作不是取平鋪直敘式的通史寫法，也不是一個一個人物式的「學案」估衡，而是以問題為中心。其所設置的問題，舉凡求是與致用，官學與私學，學術與政治，專家與通人等，都是關係到現代學術之建立及其走向的關鍵問題，也是他所關心的學術傳統這條血脈。這種看法顯然比僅僅從技術上把握學術規範更具深層意義。實際上，我們這一代的學術規範意識之所以薄弱，很大程度上不僅是學力不夠，更是缺乏學術上的「師承」關係，也就是無學術傳統可言，缺乏學術的「根柢」。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之所以從反省文革，到反思50年代以來建造的意識形態，再回到五四啟蒙傳統；從反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選擇，到重新認識非主流的思路，再到開掘中國傳統人文資源；為的就是尋找中國學術的「根」，挖掘和構建民族文化的偉大傳統。

學術史研究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研究學術內部的問題，如老（子）學史、經學史、紅學史、小學史等專門的學術問題；陳書中的第五章〈作為新範式的文學史研究〉、第六章〈關於經學、子學方法之爭〉大概可歸於這類問題；二是研究學術與其他層面的關係，如學術與社會、學術與政治、學術與市場等，這可稱為知識社會學、知識政治學、知識經濟學。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學術的外部矛盾極為激烈，因此，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社會、學術與經濟等外部關係也就比較複雜，如何處理學術與這些層面的關係也就成為人文學者特別敏感而又十分棘手的問題。

造成這一現象的客觀原因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比較動盪，政治氣候變化無常，它不僅干擾學者們的視野，同時也激發學者們的熱情，引起他們連綿不絕的思考。從主觀上來追究，隨著專制主義的政治秩序走向崩潰，傳統的學術與政治的依附關係逐漸解脫，學者的自主意識明顯增強，學術獨立的品格凸顯出來，由此學術與其他層面的矛盾與衝突也變得更為突出。

陳書花了相當篇幅來討論這一問題，其意在凸顯學術獨立的精神。第二章討論章太炎關於官學與私學的關係，陳書認為，章太炎終其一生基本上是一個在野的思想家，對官場始終沒有好感，對朝廷興學的誠意及效果抱懷疑態度，對「暴政」與「利祿」對學術的雙重摧殘有深刻的體會，故對康、梁將振興學術的希望完全繫於朝廷的自新很不以為然。章氏對二千年來的私學傳統十分推崇，以為就學術貢獻而言，私學的貢獻在官司學之上。章太炎的「學在民間」要求不僅僅是出於反清的考慮，更是在總結中外歷史所得的一個結論，是對「學術獨立」的一種訴求。

第三章以胡適為例證，評論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陳書著重考察胡適對政治的態度，在述及胡氏對學潮的態度時，陳書認為：

在所有論及學潮的文章中，胡適談論的中心不是該取何種政治信仰，而是該如何處理問政與求學的關係。前期相對傾向於肯定學生的問政熱情，後期則突出學生求學的天職。由於學潮乃現代中國政治鬥爭的重要手段，胡適此等學究氣的勸說實際起不了多大作用，徒然被對立的政治集團同時曲解為「煽動學潮」或「鎮壓學潮」。

胡適這種處理學潮的態度與政治家處理學潮的策略頗有矛盾，因而往往兩邊都不討好。陳著一反過去貶抑的觀點，對胡適持「同情的了解」。實際上，胡適的這種尷尬處境是當時教育不獨立、學術不自由的一種反映。

中國自古有修治學術史的傳統，現代學術史可以說是一項「新寫」、「續寫」的工作。這一工作目前多在一些人物個案研究層面展開，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如「學術編年」、「學案」、學派研究，還顯得很不夠，以致我們對現代學術還需用一種「考古的心態」去發現歷史。陳平原這一部書應當說樹立了一個很好的範例，也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說到底，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不應僅僅是西方的一些學科觀念的引進，還應包含一種現代學術精神的確立，這種學術精神又畢竟離不開中國傳統的人文資源的支援。陳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注入了濃厚的學術規範意識，突顯了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學術獨立精神和其挖掘中國人文的傳統資源的一面。這對重新建構一種比較健康的學術傳統，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人文學術建設，我以為都是一件有價值且必需做的事。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